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夏洛蒂·勃朗特传

〔英〕盖斯凯尔夫人 著



这部传记早已被公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传记之一，而且也属英国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之一盖斯凯尔夫人的最佳作品。

夏洛蒂·勃朗特传

〔英〕盖斯凯尔夫人 著



夏洛蒂·勃朗特传

盖斯凯尔夫人 著
张淑荣 李洪顺 译
袁升文 王丽娟
张 鹏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洛蒂·勃朗特传/(英)盖斯凯尔夫人(Gaskell, E.)著;张淑荣等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8

(外国名人传记系列)

ISBN 7-80130-375-X

I. 夏… II. ①盖…②张… III. 勃朗特, C. (1816 ~ 1855)-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681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uanjiech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印张:16.75

字数:37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00 年 8 月 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80130-375-X/K·120

定价:26.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这幅画是由她们的弟弟所画，画面从正中央被一根柱子分开。在柱子的一边，有阳光照射，光线充足，夏洛蒂站在这一边，穿着当时那种有羊腿形的袖子和大领子的成年女人式样的衣服。在阴影的一边，画的是艾米莉和安妮，安妮那温和的脸庞靠在艾米莉的肩膀上。艾米莉的脸给我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夏洛蒂充满忧虑，而安妮则充满柔情。



两个妹妹看上去好像还没长足，尽管艾米莉看上去比夏洛蒂还高一点。她们都是短发，穿着小姑娘式样的裙衫。我记得在看着这两个抑郁而真诚、略带阴影的脸时，心中曾想到是否能从这上面找出预示着夭折的暗示，我曾抱有一个迷信的希望，希望那根柱子把她们的命运同那站在画布上的夏洛蒂分开，正如她在生活中还活着一样。

导 言

1

《夏洛蒂·勃朗特传》不但是早已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传记之一，而且是传记作家的杰作。在写此传记前，作者早以其小说奠定了其赫赫文名。1855年，盖斯凯尔夫人初次收到夏洛蒂·勃朗特父亲的婉言相邀：“就按照您认为的可取和适当的方式写一部有关她生平和著作的或短或长的书吧。^①而在此之前，盖斯凯尔夫人已经写了三部大部头小说，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除此之外，她还出版了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克兰福德》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但它只是盖斯凯尔风格独特、深受欢迎的作品中的一例。《夏洛蒂·勃朗特传》后来从多方面来看都是盖斯凯尔夫人文学生涯的转折点：她早期的长篇大作像《玛丽·巴顿》（1848）、《露丝》（1853）和《北方与南方》（1855）所关注的无一不是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这些作品既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同时也让人钦佩。而《传记》非但没有给其作者带来远离争议的短暂喘息，反而使她卷入了更多的争议，所以，当她后来重新回到小说创作时，她的如释重负感难

^① T.J. 怀斯和 J.A. 塞明顿 1932 年所编 4 卷本《勃朗特一家：生平、友情和信札》中的第 4 卷的第 190 页。在此传记中，夏洛蒂一直被称为“具有莎士比亚智慧的勃朗特”。（参见《传记选》和本书的英文版第 31 页）。

以掩饰。盖斯凯尔夫人后来的作品转向了乡土，或如《西尔维亚的恋人》那样的历史背景。实际上，她后来的作品没有一部能使她在思想和情绪上受到莫大的困扰，而以前这对她来讲却是她的文学作品带来的必然后果。

2

夏洛蒂·勃朗特逝于1855年3月31日，而此时她与父亲的助理牧师阿瑟·贝尔·尼科尔斯结婚才刚刚9个月。毫无疑问，她是死于肺结核，而在1848年到1849年间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在8个月中因此而相继逝去。在去世前她已怀孕，而对于一个已经39岁的病弱女人来讲，这无疑是一种潜在的灾难。夏洛蒂的去世直接影响到家中幸存的两个人：她的父亲——倔强的帕特里克，当时已经78岁了，和她的助理牧师丈夫。帕特里克的感情对这位助理牧师从好处讲是很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再也没有比勃朗特一家更令人伤心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了。在帕特里克主管霍沃斯最后6年的日子里，他想不到会同自己鳏居的女婿同住一所牧宅，而且他对女婿毫无感情可言，但女婿的责任感又使得他有义务去照顾这位一生多灾多难的耄耋老人安度晚年。

广大的文学界也同样感觉到了夏洛蒂的去世带来的巨大损失。她的三部巨著《简·爱》（1847）、《雪莉》（1849）和《小村庄》（1853）早已使她蜚声文学界，然而她使用的是笔名，虽然这一点慢慢为人所知，但她一直住在偏远的约克郡的小村庄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这无疑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同样也使她更加闻名。夏洛蒂曾去过几次伦敦，盖斯凯尔夫人也将其

记录在了《传记》中，但在伦敦她近乎疯狂地想低调处理。因此在她死后，许多讣文的论调是各种各样的推测而非精确说明的情调，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帕特里克·勃朗特采纳了夏洛蒂最亲密的老朋友埃伦·纳西的建议，去请盖斯凯尔夫人写一部有关夏洛蒂的正规的传记。

实际上盖斯凯尔夫人是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她于1850年8月在詹姆斯爵士和凯·沙特尔沃思夫人的滨湖居所与夏洛蒂首次会面。这两位小说家此后一直通信联络，或许更重要的是夏洛蒂很想彼此探访，因此她们经常去彼此家中拜访。夏洛蒂曾三度去盖斯凯尔夫人在曼彻斯特的家——“普利茅斯小树林”，而在1853年盖斯凯尔夫人也收到了来自霍沃思的一次很难得的邀请，在那里她初次见到了帕特里克·勃朗特，正如在本传记中所讲的一样，帕特里克给她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夏洛蒂和盖斯凯尔之间的互访虽然非常少，但毕竟是存在的。夏洛蒂是个非常淡于交际的人，因此她们的互访表明这两位小说家都有彼此相吸引的方面。夏洛蒂曾明确地讲她很钦佩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特别是《露丝》，她也曾对盖斯凯尔夫人的女儿们表示过不是很正式但却很深厚的情感，这些都说明夏洛蒂与盖斯凯尔夫人感情很好。夏洛蒂生来就不喜欢孩子，而这次她克服了自己的不喜欢，说明她对盖斯凯尔夫人非常有感情。从某些方面来看，盖斯凯尔夫人似乎很少称赞夏洛蒂的文学成就，虽然夏洛蒂称颂她的文学才能。虽然《简·爱》被人们誉为天才之作，而且盖斯凯尔夫人也自然地接受了它，并对其开始部分有详尽描述，而且她对勃朗特姐妹尝试出版作品时的磨难具体作了说明，但在本传记中，盖斯凯尔夫人对勃朗特姐妹小说的评论通常要么限于其作者生命中特定的事件和环境的描

述，要么就只提及《评论报》对三姐妹小说的反映。她自己虽说也有评论，但那通常都是泛泛而不够深入，请看她在本书第二卷第二章中所作的评论：

从此夏洛蒂·勃朗特的存在分成了两个独立部分——她的作为小说家柯勒·贝尔的生活；和她的作为夏洛蒂·勃朗特女性的生活。

盖斯凯尔夫人在转向“夏洛蒂·勃朗特”前，她对“柯勒·贝尔”的评论只用了一页的篇幅。而在那一页的最后，盖斯凯尔夫人只对勃朗特作了推测性的评论：

可能只描写令人愉快的人或事时会更好一些（那样的话可能什么都写不成了）：

我想说的是，我相信有如此天才的女人从没像她那样在运用自己天才时的责任感。至于错误，不管男女作者，都会有的——他们在上帝的审判前都会有的。（本书第二卷）。

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在谈到有人指责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粗糙”时，盖斯凯尔夫人同样表现得非常含糊，这使读者感到她的做法令人难堪。在阅读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时，读者在涉及她想回避的道德问题时，都不会对她惯常采用的躲闪口气感到陌生（比方说她对《玛丽·巴顿》中罢工的处理方式，又如她对《露丝》中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困境应负什么样的责任的模棱两可）。从种种迹象来看，盖斯凯尔夫人对勃朗特姐妹

的文学作品很熟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对这些作品非常欣赏，但她对她们姐妹的文学成就并不是很自在。我想我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盖斯凯尔夫人对夏洛蒂文学批评的尴尬可能暗示着她与夏洛蒂·勃朗特之间有更大的差异。我已经讲过，从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气质来看，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个很封闭的人，或许她自己并不希望如此。而且她激烈的情感和无常的心理状态因其生活环境而走得更偏，这样它们就会在夏洛蒂的小说中找到宣泄的突破口，因此与之同代的人发现按常规的行为习惯来衡量，她的小说描写使人深感不安。夏洛蒂对政治、宗教和文学的评论很偏激也让人难以预料，而且她对在社会中的成功心存蔑视，这很可能源于她的妒忌，这是受压抑的必然结果。比方说她对萨克雷的矛盾看法：她认为自己该崇拜萨克雷，但她又不无担忧地发觉萨克雷^①在纵情自己的才华时，又有道德上的疑点。反观盖斯凯尔夫人，她不仅是位有着和睦家庭的幸福的母亲，而且在文学界也很知名。她的文学事业使她得以享受来自知识圈和文学界的人的陪伴。而她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外出交往旅游。总之，她有自己的文化生活，而绝非像大卫·塞西尔勋爵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中那歪曲性的评论所说的，她是一个“讨众人所好的人”，他还说“她满怀优雅有分寸的热情做着唯一派牧师的太太该做的事情，同时把男性看成是自己理所当然的仁慈主人”。我们现有的证据表明盖斯凯尔一家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相当复杂，这样的

^①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 - 1863) 与狄更斯同时代并齐名的英国作家，作品以讽刺见长，主要作品有《名利场》、《彭登尼斯》等。

评论是远远不能沾边的。

当人们想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的不同时，他们往往会认为她俩的友谊实际上是相左又相亲的结合物。她们俩性格迥异却有如此交情，这有点不可思议却更证明了友情的牢固。我认为形成最终在本传记中她们二人友情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不管她们的社会阅历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差异，两位女性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首先我们在她们牺牲自我追求责任中发现她们的虔诚。这种伦理观贯穿于盖斯凯尔夫人所有的作品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其次，从她们刚刚建立友情时盖斯凯尔夫人就在夏洛蒂身上发现了她小说中女主人公身上所有的活生生的气质和优点。这样说来，这一评论可能使人感到盖斯凯尔夫人在建立这种友情时几乎不太正常，我认为这种想法不恰当——在本书的第二章，一开始盖斯凯尔夫人就坚称“我亲爱的朋友夏洛蒂·勃朗特”。但是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情况与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其相似，而且这对本传记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是不能否认这一巧合现象的。

前面我已提及，盖斯凯尔夫人写作这本传记最初是应帕特里克·勃朗特的邀请。但是巧合的是在此前两个周盖斯凯尔夫人显然给夏洛蒂·勃朗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写过一封信，大意如下：

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我写的这本书对任何生者都没有伤害的话，我想写一本我所了解的她（夏洛蒂，译者注）好让世人（如果我的文字有足够表达力的话）来尊敬

作为一位女性的她正如人们把她当作一位作家来钦佩一样。^①

从后来出版的这本传记来看，盖斯凯尔夫人所表达的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几天后她又给史密斯追加了一封更长的信，信中满是对霍沃思的追忆，最后这封信同样提出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愿望：

通过这本书人们可以了解她奔放和忧伤的生活和令人愉快的性格，这一时刻会到来的。（《盖斯凯尔书信集》，第345—346页）

就像心有灵犀一样，偏偏在此时帕特里克·勃朗特的邀请信恰到好处地来了。

实际上盖斯凯尔夫人对夏洛蒂·勃朗特生活的奇迷不是在夏洛蒂去世后才开始显露的，而是早在1850年的夏天，她们在凯·沙特尔沃思家初次相遇时就开始了。

盖斯凯尔夫人同夏洛蒂相处的日子只有3天，但她给她的朋友凯瑟琳·温克沃思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详细地谈了她对夏洛蒂的印象，絮语霍沃思的种种境况，因此说这封信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本传记的雏形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写道：“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勃朗特小姐那样的生活。”然后显然是听了凯·沙特尔沃思太太的介绍，她又说她想详尽地写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

^① J·A·V·查普尔和阿瑟·波拉德合编的《盖斯凯尔夫人书信集》，1966年版P345。（参看《传记选》）。

的女主人公一生的事业，还没有小说家敢对此做出尝试呢。我已讲过，夏洛蒂·勃朗特具有盖斯凯尔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所有优点：像玛丽·巴顿、像《北方与南方》中的玛格利特·黑尔，甚至有点像《妻子和女儿》中的莫莉·吉布森。她有着在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里照料鳏居而又难以相处的老父亲的责任心；正像盖斯凯尔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最直接地面对死亡与疾病，而她则又勇敢地活了下来。她正直的道义在其超人式的克己行为的映衬下更为突出。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确的詹姆斯式的主题了：她们初次相见时唯一的缺憾就是传统的幸福婚姻的结局，也即后来夏洛蒂与阿瑟·贝尔·尼科尔斯短暂的结合。不祥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的观察很具预言性：“不容置疑的是她自己也已患上了肺结核。”

因此从一开始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环境就激发了盖斯凯尔夫人的文学想象力，她作为小说家的本能将对后来写作此书，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评价此书时我们还应当考虑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这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欣赏的特别之处有关。那个时代，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注重满足读者的需求的，这也是在那个时代传记这一文学体裁流行的原因。

3

在其191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中的前言中，作者林顿·斯特雷奇哀叹本世纪人们不把传记当作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来对待，他解释了他的先行同行在这一领域的传记有死气沉沉的弱点：

英格兰的传记艺术仿佛遇到了其倒霉的时代。我们的确有几部杰作，但我们却从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伟大的传记传统……对我们来讲，这门写作艺术中最精致的、最富有人情味的写作形式已委身给了那些文学的工匠；我们没有去想写一部好的传记正如好好过一生一样困难。我们用厚厚的两卷本来纪念死者，这成了传统——而死者却不知，这些长卷却是作者未加消化的东西，风格散漫、充满了令人腻味的赞词，令人可悲的材料堆积，既缺乏独创又不见结构。它们就像那殡仪工组织的庄严肃穆的长长的送葬队伍一样带着死缓的葬礼的鄙俗。这使人禁不住想起有些传记是某个小官僚在离任时的匆忙之作。

这容易让人猜想在打这个比喻时，斯特雷奇是否想起了1882年开始主编《英国人物传记词典》的莱斯利·斯蒂温爵士，^①他于1891年因病退休，按斯特雷奇的话说他是自古以来最大的豪华陵墓的设计师。我们不妨认为斯特雷奇的做法只是简单地将尸体加以解剖而不是将其体面地葬掉。但是斯特雷奇的评论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评论以其独特的方式解释了上个世纪所采用的传记形式和传记重要性的实质，那“厚厚的两卷”——在很多情况下不止两卷——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现象，可能文学史家还没有对它进行应有的关注。^②关于这种体裁的流行，本书就可提供足够的证据。夏洛蒂的出版商总

^① Sir Leslie Stephen (1832-1904)，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Virginia Woolf之父，主编了《英国人物传记词典》前26卷，著有《18世纪英国思想史》等。

^② 本导言出版后，A.O.J. 科克沙特出版了其《生命真理：19世纪的传记艺术》(1974)。但是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一点也没提到。

是善意地寄给她一些书籍，其中总有传记方面的书，其中不乏像斯坦利的《阿诺德传》（1844）这样的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这类较次要的作品也有如爱默生的《代表人》（1850）——可称得上是跨洋之作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以及 C.C 骚塞的六卷写他父亲的《生平与书信》（1849—1850）。这类作品中的很多是来自于亲子抑或是妻子的怀念——如金斯利夫人的两卷本的记述其亡夫的《生平与信札》（1877）——但是不管这些作品的出处和质量如何，从出版商的名单和《评论报》对其观注程度来看，民众对它们的需求显然是非常迫切的。《英国人物传记词典》的最后一卷出版于 1900 年，这实际上是传记风格的流行和大众品味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我们是不难看出传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的。正如那个时期的小说一样，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体裁已到了其完全成熟的阶段，传记叙述的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如何做人的魅力。实际上传记比小说还要有优势，因其具有“真实性”，所以它既吸引历史学家又受爱想象的读者的欢迎。这一明显的优势后来很快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素材的取舍问题。但是这种体裁却提供了一个纪念伟人的机会，这既是对逝者的赞词又是为生者提供的楷模。而维多利亚时代又是一个个人奋斗和道义缺一不可的时代，所以传记一如既往地受到那个时代人的欢迎。在评论克罗克 1831 年编辑的博斯韦尔所著的《约翰逊传》时，卡莱尔给读者讲了传记的价值（后来此书是以《传记》之名重印的）：

去了解我们的同类，摸透他，去理解他的一举一动，去解开他神秘的疑团：不，不仅仅要摸透他，还要去看看

他的周围是什么样子，去看见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理论上去理解他，几乎能看到他活生生的样子；现在就让我们彻底地来分辨一下他属于哪种人，他做什么样的事，过什么样的生活！……不仅要用人类一般的话语，还要用所有的艺术来表达，这些艺术是或应该是浓缩并保存了人们言行的精华，本传记就是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件……

在指责小说是“虚构者知道他正在虚构，知道他正在做着‘撒谎’的事，这完全不是我们怀疑他这样”后，卡莱尔奉劝他的读者“与最伟大的虚构的事件相比，最微不足道的历史事实也令人难以忘怀，想一想吧”。作为同样为传记这一文学形式摇旗呐喊的好友，不同于林顿·斯特雷奇的是卡莱尔显然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打算。但无论如何，卡莱尔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知识现象的关键。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按其规劝行事，从他自己的《斯特林传》（1851）到塞缪尔·斯迈尔斯的《工程师传》（1874）都是很好的说明。人们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们对把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动机的疑虑和阅读传记所需的品味的看法。但是直到社会对传记的需求到达鼎盛时，人们才发出了反对的严肃呼声。而与此同时出版商们则一直在满足民众的需求。

对卡莱尔这位传记作家来讲，在能够利用的传记材料中，最容易得到的就是他所写的传记人物的通信。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传记都像《生平与书信》一样分为两卷，一卷写生平，一卷写信札。还有一种很细腻的写法就是在传主的书信中夹插进作者的评论，这种手法被卡莱尔本人在其《奥利弗·克伦威尔

信札与语录》(1845)用得淋漓尽致；而J.W. 克罗斯在其三卷本的《乔治·艾略特传》(1885)中则用得较为谨慎。《夏洛蒂·勃朗特传》实际上是这种写法的一个变种。盖斯凯尔夫人曾明确指出她主人公自己的信函应在传记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此为原则，这也是我一直奉行的准则——该用夏洛蒂·勃朗特原话的地方就不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我将根据日期从这一系列（即夏洛蒂·勃朗特的通信）中引用。

这种信件引用的广泛，当然是基于体现传记“真实”的原则。但是传记作者孜孜不倦地寻找和利用这样的材料却易引起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不可预见并使传记作家的的工作迟疑不前。这一问题显然在纪念性的传记中是肯定存在的：如果仅依靠科学研究的办法的话，圣徒传记作者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这个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身上特别强烈，因为他们深信可以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道德价值及其所处的时代中学得劝世之道，但他们很难接受不可否认的“事实”的价值。而传记这种体裁本身就反映了事实和选材的冲突，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不独是《夏洛蒂·勃朗特传》，而且许多其他伟大的维多利亚传记作品从洛克哈特的《斯格特传》（1836—1838）到弗劳德的《卡莱尔传》（1882—1884）都使其读者感到非常痛苦。早在1849年丁尼生就发表了一首诗《致——读生平传记有感》，通过这首诗他严厉地指责传记作家窥人隐私的行为：

现在诗人无法安息，
他的诗也不会永落尘埃，